时文美文

高三（上）第3期 总28期 主办：高三语文组 本期主编：尹迎君 2016-9-26

**====================================**

**宽恕绝不是遗忘**

陶东风

原发2010－11－13《北京青年报》

[核心提示]回避历史的灾难，不认清彻底地反思这种灾难，灾难是不可能过去的，无论是在社会和解的意义上，在制度建设的意义上，还是在心理康复的意义上，都是如此。

《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媒体近日报道了当年外国语大学学生、红卫兵、现已经60多岁的申小珂等人，向当年的北外党委书记、现已87岁的程璧等老教师、老领导致信道歉的事件。同时还有原北大附中的学生红卫兵向北大附中退休教师道歉，北京矿业附中的原学生红卫兵向该校退休教师道歉，等等。

在我看来，虽然这些道歉事件目前看来还刚刚开始而且是个别现象，但其意义仍然不可小觑，如果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那么，有可能成为全面彻底反思历史的契机。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道歉才刚刚开始就已经有很多人对道歉的必要性心存怀疑。雅虎视点的调查显示，在回答“如果您或亲朋曾受到折磨，你会原谅（道歉者）吗？”这个问题时，37%的调查参与者认为“没意义，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在所有回答中，这个回答的比例最高。这就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下道歉（以及相关的宽恕）在今天以及未来的重要意义。

申小珂等人的道歉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在整个社会和政府还没有就历史做出全面、深刻、彻底的反思时发生的，是在历史灾难的最主要制造者的责任还没有充分清算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个人行为。**因此，这种道歉和忏悔的动力主要来自个体的良知及其对民族、历史的责任意识。正如有道歉者说的：“我们不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只想在自己的心灵净化过程中找到一点民族的良知”，**“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也是为了后代负责。”可惜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少而又少。揭发、检举、侮辱乃至无端殴打自己的老师，这些不光彩的事情很多红卫兵肯定都干过。除了已经披露的少数人外，大家至今都还装聋作哑，讳莫如深，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一切。我敢肯定，这些人不可能重获自己的尊严。

光是这点就能够说明：“文革”没有过去，它首先在经历者——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的心理层面就没有过去，施害者不敢面对、不敢承认自己当时的不光彩言行，希望继续隐瞒下去；受害者也不愿面对、不愿意回忆自己所受的迫害，他们不想“再受一次侮辱”。记忆的审查机制依然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力量。“文革”确实还是一个禁区。

**这首先不是个人的错，而是我们还没有健康的、制度化的反思文化、道歉文化、忏悔文化和宽恕文化，还没有如何理性面对灾难、特别是自己参与制造或亲自承受的灾难的心理准备。**这种回避历史的态度不但无助于个人心理健康的恢复，不但施害者无法从自己的愧疚感、罪疚感中解脱，受害者也无法从自己的受虐狂想症中解脱（正如《南方周末》的报道说的：“当年‘口含天宪’的红卫兵以及命如蝼蚁、劫后余生的教师们，在劫难后遗症这一点，是平等的。噩梦、仇恨、惊恐、自责、羞愧。这些负面情绪，几乎会随时降临”），更加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回避和遗忘的态度无法使我们的民族从劫难中走出，真正开始新的生活，开启光明的未来。

我从来不是仇恨的鼓吹者，我以为宽恕是面向未来的积极态度，仇恨则是纠缠过去的消极态度。但我更认为宽恕不等于遗忘，宽恕的前提不是遗忘，而是揭示历史真相，汲取历史教训，在理性地彻底地反思历史的基础上，施害者（不管是不是受到了蒙蔽）应该真诚道歉。有施害者的道歉，而后才能有受害者的发自内心的谅解和宽恕。

现在学术界有些知识分子在鼓吹所谓“积极遗忘”论。我也不是无条件地宣扬沉浸在过去，有些东西或许应该“遗忘”，以便更好地面向未来。但“遗忘”必须是有条件的，必须是揭示真相、理性清理历史问题之后的“遗忘”，是一种理性的决定（如果是集体的灾难记忆，则必须是集体的决定）。为了报复的记忆当然不好，是一种消极的记忆。我们常常说的“记仇”就是这种消极记忆，它的意思是纠缠于仇恨，它意味着记住苦难的目的不是为了最后的和解和宽恕，而是为了报复。“孩子啊，你要记住，要为XX报仇啊！”这是一种恨的教育，是为了报复而记忆。这样的记忆只会使得人类陷入恨的循环，报复的循环。

但是，摆脱这种恶性循环的途径并不是所谓遗忘，而是直面事实、公布真相、弄清是非之后的和解。它只能是建立在理性对待过去的基础上。加害者的道歉，对灾难的原因、性质、责任的认真负责的反省和清理，是宽恕的前提，它的意思决不是简单的遗忘，决不是和稀泥。“道歉”的意义或许就在于这里。道歉意味着过去的是非曲直得到了分辨，教训已经被记取，灾难的原因、性质、责任已经得到认真、负责的反省和清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要求受害者宽恕，这样的宽恕才是理性的、真正的宽恕，而不是无可奈何的“算了吧”。更何况受害者个人的不计较（“算了吧”）并不是总是值得称许，关键是要分析这种不计较的性质：是自愿的、积极的、发自内心的，还是无奈的、被迫的、消极的，是由于环境因素造成的。其实，直面过去的灾难，对于过去的是非曲直的理性清理，同样是受害者的责任，更主要的，这种清理是对历史，更是对后代的负责。因此，即使对过去的不幸记忆同样会使受害者陷入痛苦，但出于群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原因，记住痛苦的遭遇，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把它公开，同样是受害者的责任。这种“再一次的受害”是必要的。

回避历史的灾难，不认清彻底地反思这种灾难，灾难是不可能过去的，无论是在社会和解的意义上，在制度建设的意义上，还是在心理康复的意义上，都是如此。

**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对作家内心不自由的惩罚。----马克思

**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胡风如此，（1952年文化整风运动，有人批评胡风“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中共中央认为他坚持的错误文艺理论，在一些文艺工作者中有不良影响，决定对其文艺思想做公开批判。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胡风两次入狱）。胡风为之执幡护灵的鲁迅也是如此。**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一个时代没有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有了悲剧，知识分子们竟如妇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对悲剧尊严的辱没。**

对悲剧尊严的辱没岂止从今日开始？

1986年8月一个炎热的夜晚，巴金提笔祭奠自己的亡友胡风。这个80多岁的老人颤巍巍地说：

“在那一场‘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1955年的事。”（巴金：《随想录·无题集》）【《随想录》是巴金晚年创作的一部杂文集，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

1955年发生了什么事？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把另一个知识分子多年来给自己的私信统统抖落出来，提供给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几家报纸之一《人民日报》，制作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第一批材料。接着，政府查抄胡风私宅，把更多的私人通信公之于众，并且分门别类，加上按语，抛出所谓第二批、第三批材料。然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一哄而起纷纷“向井囗投掷石块”（巴金语）争先恐后地在那家报纸或其他报纸上发表讨伐胡风的文章，咬牙切齿，声声可闻。那两个月里发生的事情都辑录在《人民日报》上。翻一翻这家报纸1955年5月至6月的合订本，后代人既为那三批按语无限上纲罗织文网的强横逻辑而震惊，也为当时知识分子同类相残的可耻记录感到羞耻。请看这些文字：

“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后，愤恨的烈火把我血液烧得滚烫。”

“我看穿了胡风的心；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

“胡风，你是九尾狐，你的主人是谁？当胡风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了猖狂进政以后，不久就传来了台湾广播热烈的响应。”

“请依法镇压胡风，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

“胡风娘家是中美合作所”，“他们不仅是狼种，而且似乎又当过狐狸的徒弟”，“要彻底消灭这批狼种”。

“胡风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风与胡适的区别是一种灰色蛇与白色蛇的区别。”

上述语言的作者，既有刚殒落不久的一代文坛巨擘，也有至今还抱享盛誉的人民剧作家；既有当时曾轰动一时的山药蛋作家，也有直到现在还当之无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当然，也少不了后来被称之为反革命文痞的姚文元。然而，在这么些文字中，后来的读者能猜得出哪一句是出自姚文元之口吗？你拣最丑恶的猜，也会猜错。悲剧不在于谁比谁丑恶，而在于后来的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在伤害最早也是最优秀的一个殉道者时，竟使用起同一类语言！

人常说，那三批按语是后来一切整人哲学、整人语言的开始，但是忘了补充一句：围绕三批按语发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后来街头大字报语言的开始。这类文章，尤其是这类文章所使用的思维方式与日后红卫兵的语言、红卫兵的思维方式有什么差别呢？“狼种”、“狐狸”、“九尾狐”、“彻底消灭”、“严厉镇压”，30年后，红卫兵毫不犹豫地代之以“牛鬼”、“狗崽”、“炮轰”、“砸烂”！**早在红卫兵学会糊大字报以前，大字报的语言不就已由他们的前辈准备好了吗？区别在于红卫兵使用这类语言，是由他们的教育决定的，而前一代人开创这类语言，则是由更为可悲的劣根性决定的。红卫兵从学会读报那天起，接受的就是这种语言教育。**他们只有这一种语言，没有人教他们第二种语言。灾难过后，他们当然要低头忏悔，但他们至少还可说一句：“我们的罪过是无知，而不是虚伪！”一代文化巨擘，还有这个“家”、那个“权威”却不一样了，他们是说着另一种语言长大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曾经亲履西土，受过系统的民主教育，起码是文明教育。他们应让知道使用这种语言，远远超出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规范。**这不是文明人使用的语言，谁使用这种语言，谁首先就剥夺了他自己的内在尊严。**当红卫兵忏悔的时候，他们也应该忏悔，甚至更应该忏悔！因为他们当时就应该知道使用这种语言，不是出自野蛮，就是出自虚伪，因而，也就更应该承担良心的责任。

“狼种”、“九尾狐”、“灰蛇”、“白蛇”，一场真正的理论冲突和政治悲剧就是被这种几乎是村妇相讧的语言辱没了，冲淡了，冲淡成丑剧；然后，再向外蔓延，越出胡风事件的个人范围，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足够污染几十年文化氛围的空间内收敛还原，还原为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大悲剧。当后一代人重读那三批“按语”和那一批文章时，将难以抑止内心泛起的强烈的厌恶之情。人们甚至会这样说，连“丑恶”都可以分出档次：那三批按语？虽然强横，却还留有强横者的气势，强横者的文采，尚可称“恶而不丑”；而一批助恶帮闲的文章呢？则落入更低一个阶次。它们虚假到了极点，也虚弱到了极点，助恶无作恶之“力”，助恶无作恶之“美”，只能称为“丑而不恶”！需要付出多么沉重的心理代价，后代人才能相信这就是我们中国惟一受过民主教育的那个阶层在当时使用的语言？等到这个阶层都已习惯于使用这类语言时，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费希特有言：“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中国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就是这样开始的。1955年反胡风，1957年反右，1966年文革，一场接一场如雪崩般发生。整个社会像被人在山巅上推下的巨石，迅速向下滚动，直到最后滚入教育、文化、儒理乃至文明规范的崩溃深渊。从这类灾难中过来的一些知识分子现在都已学会如何控诉这些不公正的事件了。但从50年代中叶那次可耻的投降以来，他们哪一天不是在虔诚地等待这一切，召唤这一切，甚至叁与制作这一切呢？他们掘土埋葬同类，随之亦挖出了自己的墓穴。五五年卖友求荣者，五七年落网；五七年漏网偷生者，六六年一网打尽；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会有人出来说，这是违心的，那是被迫的，请宽恕知识分子们在高压的不光彩行为。即以胡风为例，他们承受的政治压力再高，也高不过胡风身为囚徒在监狱中的生死压力。1966年夏，胡风尚在服刑。官方来人要他揭发周扬问题，威逼兼利诱。人们都知道胡风揭发周扬，无论如何都不为过；此时胡风不揭发周扬，则可能加重刑期，甚至被推向极刑。是报复宿敌，以求获得“正当”的自由？还是顶着压力，甘冒生死之祸，保全一颗知识分子的良心？胡风的态度是：

不管报上说得怎么吓死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决不在这里为某个人说一句坏话或一句好话，问题是怎样就说怎么样。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像这样来批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难以服人。（梅志：《胡风传》载文汇月刊1987年9月号）

一个因徒在生死关头作出的回答，将使无数养尊处优者的所谓“违心之论”无地自容。这个因徒不愧是鲁迅亡灵的护送者。

还是回到巴金这里来吧。在那个炎热的夜晚，这位老人接着又说：“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50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在一个没有罪感氛围的轻浮国度里，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老人完全可以带着他的隐私或污迹安然离去，不受任何谴责。现在，他突然觉得自己的灵魂中有罪恶，不吐不快，终于说出这一番富于忏悔意识的语言，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再造的开始。但也仅仅是开始。不幸的是，忏悔刚一举步，立刻就被一大片溢美之词甚至是阿谀之词包围了。有人说：“这是中国散文的巅峰”，又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等等，等等。相比世界历史上其他民族；远如德国，近如俄国;在大灾大难之后，知识分子灵魂拷问的惨烈程度，我们这个民族实在是不可救药。浅浅地扎一针，都要撒上大把大把的麻药，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儿童心理症，还是他们确实患上了老年衰弱症？**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一个民族只知控诉，不知忏悔，於是就不断上演忆苦思甜的闹剧。**从前是目不识丁的底层文盲；现在则轮到知识分子，这个“家”，那个“权威”。他们中的很多人将终生念叨某年某日某人某张大字报中的某句话曾加害于己，却拒绝回忆自己远比红卫兵更早，就使用过红卫兵的手段伤害过远比自己优秀的同类。**他们的“控诉”实质上是一种可怜的补偿要求，而不是那种高贵的正义之情。所以，他们从来只控诉别人对自己的不公平，却绝难控诉自己对别人的不公平，尤其是左拉式的人物左拉式的控诉为素不相识者的冤屈而控诉，为社会良心的沉默而控诉。那才是真正的控诉。什么时候能听到有我们自己左拉，在十里长街长啸一声：“我控诉！”什么时候这个国家才真正有拯救的希望。**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外界不公正事件持续发生时，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也在持续发生一种隐蔽的、却更为可怕的裂变。我们对前者已经谈论得够多了，但对后者却谈论得太少，太少。让历史学家去争论外界压力与人心崩溃孰先孰后孰果孰因的关系吧。而在人类真正的良心法庭前，区别真诚作家与冒牌作家的标尺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是否具有起码的忏悔意识。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心压力的作家，也就是从不知理想人格为何物的作家。从前他们没有理想人格的内在压力，当然就无从抵抗外在压力。一代博学鸿儒无可挽回地跌落进犬儒哲学的怀抱。现在他们没有理想人格的内在压力，当然就迷走于补偿性的外向控诉，却躲避内向忏悔，躲避严酷的灵魂考问。世界史上的优秀民族在灾难过后，都能从灵魂拷问的深渊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巅峰，惟独我们这个民族例外。没有卢梭的《忏悔》，就没有18世纪法国浪漫文学的先河；没有托尔斯泰从忏悔走向《复活》，就没有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成功；没有萨特对沦陷时期巴黎知识分子群的《恶心》，就没有20世纪西欧存在主义文学与哲学的双向丰收。还记得萨特是怎么说的吗？

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

让我们的知识分子继续控诉吧，控诉者将注定永远停留在被控诉者的水平。我们还会不断地出“诗人”，出“作家”，却绝不会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出罗曼·罗兰，出托尔斯泰！

**我控诉**

左拉

总统阁下：

为了感激您接见我时的仁慈、亲切态度，您可否允许我对您应得的声誉表示关切?您可否允许让我告诉您，虽然您军徽上的军星数量正在攀升，却受到最可耻和难以磨灭的污点玷污，它正处于逐渐黯淡的危险中。

恶名诽谤并没有使您受损，您赢得了民心。您是我们崇拜的热力中心，因为对法国来说，与俄罗斯结盟是场爱国庆典。现在，您即将负责全球事务，这是个多么庄严的胜利，为我们这勤劳、真理与自由的伟大世纪加冕。不过，令人讨厌的德雷福斯事件玷污了您的名字(我正要说玷污了您的政绩)。军事法庭居然奉命判埃斯特哈齐这种人无罪，真理与公义被打了一记大耳光。现在一切都太迟了，法国已颜面尽失，而历史将会记载，这样一起有害社会的罪行发生在您的总统任期内。

既然他们胆敢这样做，非常好，那我也应无所畏惧，应该说出真相。因为我曾保证，如果我们的司法制度——这起事件曾通过正常渠道来到它面前——没有说出真相，全部的真相，我就会全盘道出。**大声地说出是我的责任，我不想成为帮凶；如果我成为帮凶，在远方备受折磨的无辜者——为了他从未犯下的罪行而遭受最恐怖的折磨——的幽灵将会在夜晚时分纠缠着我。**

总统阁下，我将大声向您说出令正直人士强烈反感的真相。基于您的信誉，我深信您尚未发觉事实的真相。您是法国的最高首长，除了您，我应该向谁痛斥那些真正犯罪的人?

首先是有关德雷福斯审讯及不利于他的判决的真相。

一个邪恶的人主导了这一切，干了这一切：帕蒂上校。当时他只是一名少校，他就是整起德雷福斯事件。一直要到一个公正的调查清楚地确立他的行动和责任之后，我们才会明白德雷福斯事件。他看起来令人难以推心置腹且心思复杂，满脑子诡计且沉迷于运用低级小说的方法—— 偷取文件、匿名信，在荒废的地方会面、在夜晚兜售害人证据的神秘女人。说备忘录是德雷福斯所写的，是他的主意；要在一间满是镜子的房间检查该文件，也是他的主意。福尔齐内蒂少校告诉我们，帕蒂拿着尚未点亮的提灯进入犯人正在睡觉的牢房，突然把灯光射在犯人脸上，意图使受到惊吓的犯人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条件下招供。还有很多可以揭发的事，但这不是我的责任；让他们去调查，让他们寻找吧。我只能简单地说，帕蒂以刑事警官的权限负责调查德雷福斯案，以事发先后顺序与军衔而言，他必须在这起已误判的案件上负最大责任。

因全身瘫痪而去世的情报局长桑德赫尔上校曾持有该备忘录一段时间。以前曾发生过 “消息泄漏”、文件失踪，如同今日依然不见踪影一样。当有人渐渐怀疑备忘录只有参谋部炮兵团军官才有可能执笔时，当局曾设法找出此人。这是一个明显的双重错误，显示出备忘录的检验是很表面的，因为一个仔细、合理的检验就能证实只有步兵军官才有可能写下这份备忘录。

因此，他们彻底搜索前述的范围；他们检验笔迹样本，好像这是个家庭纠纷。他们认为会在他们自己的办公室找到叛国贼，然后再驱逐他离开。现在我们都熟悉这部分情节，我不想复述，但是就在帕蒂少校开始参与其事时，德雷福斯立即受到怀疑；从那时起，帕蒂陷害了德雷福斯，事件变成“他的”事件。他确信他能把叛国贼弄得十分狼狈，并且从他身上榨出一份完整的自白。当然，还有陆军部长梅西耶将军，他似乎才智平庸；还有参谋部长布瓦代弗尔将军，看来他似乎被强烈的教权主义左右了；还有副参谋部长贡斯将军受良心驱使，对事件的处理比较开明。但是，事件的发展是由帕蒂单独开始的，他牵着那些人的鼻子走，对他们施展催眠手法。对，他也玩弄招魂术和神秘主义，和幽灵交谈。他施加在不幸的德雷福斯身上的实验和所有疯狂的拷问方法——设下供认的陷阱、愚蠢的调查、荒谬的伪造文件——令人难以置信。

啊，对熟悉前面情节的人来说，那真是个噩梦!帕蒂少校逮捕了德雷福斯，将德雷福斯关入单人牢房。他立即跑到德雷福斯家恐吓德雷福斯夫人，如果她向外界说任何一句话，便会失去她的丈夫。同时，那个不幸的人正扯着自己的头发，大喊冤枉，拷问的进行有如15世纪的记录，蒙上神秘的烟幕并伴随着大量粗糙的手法。指控完全基于一纸愚昧的备忘录，而那幼稚的指控不但是颇为普通的叛国罪，同时也是最卑鄙的欺诈，因为几乎所有转交给敌方的所谓机密都是毫无价值的。我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煽动后来那真正罪行——令法国声誉扫地、恐怖的司法错误——的闸口。我想完全清楚地指出司法错误是怎样发生的，帕蒂少校如何亲手打造了这个错误，梅西耶将军、布瓦代弗尔将军和贡斯将军如何受他愚弄，以致后来必须负起这个错误的责任，进一步觉得有责任予以护卫，并视之为不容讨论的神圣真理。起初他们所犯的错误是疏忽与愚昧，从最坏的方面来说，他们屈服于自己圈内人的宗教狂热与部队精神所带来的偏见，并且纵容了愚昧。

现在，德雷福斯被传唤到军事法庭受审，一切被要求保密。叛国贼若真为敌人开启了我们的国防边界，让德国皇帝直冲巴黎圣母院，军事法庭就不能强制更严密的缄默，而且更强硬、更神秘。现在全国陷入震惊状态，涉及恐怖的行为、背叛及历史性的丑闻时，谣言自然便四起，当然，国家便向这些谣言低头。刑罚重到无以复加，叛国贼被公开羞辱，公众大为喝彩。国家的态度非常坚决：既然可耻的行径将罪人放在遥远的石山上，他便应当留在那里遭受懊悔吞食；然而，那些难以形容、危险、可能会激怒整个欧洲的指控则需要用禁止旁听的秘密会议小心地隐藏起来。这些控诉是否为真?不，当然不是!在帕蒂少校那过分、疯狂的幻想背后，什么都没有。一切不过是一道烟幕，目的是隐瞒一本粗俗、古怪至极的小说；只要细读军事法庭上宣读的正式起诉书，任何人都会相信以上所说都是真的。

那份起诉书多么肤浅!一个人有可能因为它而被判有罪吗?如此恶劣着实令人震惊，我要求正直人士都要阅读它：当他们想到德雷福斯因为它而在魔鬼岛付出不相称的代价时，他们的心将因愤怒、反感而悸动。**德雷福斯能说多种语言，对吧?这是一项罪行。在他家找不到任何有损他声誉的文件，对吧?这是一项罪行。他偶尔回乡探访，对吧?这也是罪行。他勤奋工作、求知欲强，对吧?这是一项罪行。他不易惊惶失措，对吧?这是一项罪行。他真的惊惶失措，对吧?这是一项罪行。它的措辞多么天真!它的主张多么毫无根据!**他们告诉我们，他被起诉十四项不同的罪状，但最后其实只有一项真实的罪行：即有名的备忘录。而我们甚至发现专家们并非意见一致，其中一名叫戈贝尔的专家因为敢于做出与军方期望不同的结论，便被军方施压。他们亦告诉我们，有23名军官的出庭作证不利于德雷福斯，我们仍然不知道他们被问了些什么问题，但我们确信他们的证词不全是负面的。而且，你们将会发现他们全都来自陆军部，这场审讯是个家庭秘密会议，他们全都是“圈内人”。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是参谋部想要这场审讯，是他们审判德雷福斯，而他们刚刚又对他做出了二次判决。

这样，剩下来的只有备忘录，而专家们对它的看法并不一致。他们说，在会议室内法官自然倾向宣判无罪。这情形若是真的，你就可以明白，为了证明判决有理，参谋部今天不顾一切坚称拥有一份可以确认罪状却不能亮相的文件，这份文件使一切合法化，我们必须向它低头服从，好像服从一位隐匿不可知的神。我拒绝接受任何这样的文件，我全力拒绝!可能是某张可笑的纸碎片，也许是那份提及随便的女人或要求越来越多名叫“D”的人的文件；无疑地，是某个丈夫或某人觉得利用了他的妻子之后并未支付足额费用。可是，那张纸不是与国防有关、公开后会立即导致战争吗?不!不!那是谎言。**更令人憎恶、更具讽刺性的是，他们的谎言不会使他们遭受任何伤害，没有任何方法判他们有罪。他们把法国弄得天翻地覆，躲藏在他们造出来的合法喧嚣中，借着使人心战栗和心智扭曲堵住人们的嘴。据我所知，危害社会的罪行莫过于此。**

总统阁下，这些事实解释了误审是如何造成的，而关于德雷福斯的性格、他的财务状况、缺乏犯罪动机、从未停止大喊无辜——这一切都证明他是帕蒂少校过度想象力的牺牲品，也是军方盛行的教权主义的牺牲者；而对“污秽犹太人”的狂热追猎，则使我们的时代蒙羞。

现在，让我谈谈埃斯特哈齐事件。三年过去了，许多人的良心仍然深感不安、忧虑、烦恼，因而使他们进一步查看，最后他们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

我将不再回溯有关舍雷尔克斯特纳起初的疑惑以及后来对事件肯定的故事；然而，当他进行他的调查时，参谋部内部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桑德赫尔上校去世了，接替他任情报局长的是皮卡尔上校。皮卡尔履行职权时，有天拿到一封由一名外国特务写给埃斯特哈齐上校的信，他在强烈责任心的驱使下展开调查，但若非有上司的同意，他不会采取行动。因此，他向直属上司——贡斯将军，然后是布瓦代弗尔将军，然后是继梅西耶将军之后任陆军部长的比约将军——略述他的猜疑。人们经常谈及的著名的皮卡尔档案，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比约档案，这个档案是由属下为部长预备的，参谋部必定仍保有这份档案。调查从1896年5月进行至9月，有两件事是确定的：贡斯将军深信埃斯特哈齐有罪，而布瓦代弗尔将军及比约将军并不怀疑备忘录是出自埃斯特哈齐的手笔，这些结论是基于皮卡尔上校的调查。但是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因为埃斯特哈齐若有罪，德雷福斯的判决势必会被推翻，而这正是参谋部决定不惜任何代价避免的。

当时，与事件有关的人士必定感到无比焦虑。值得注意的是，比约将军并没有做出任何妥协，他刚刚上任，有能力揭发真相。但是他不敢这样做——无疑地，他害怕公众舆论，也害怕连累整个参谋部的职员，包括布瓦代弗尔将军、贡斯将军及部属。他的良心正与他认为什么是陆军最重要的利益相对抗，但只持续了一分钟。一分钟过后，一切都太迟了，他已做出选择：他妥协了。

从此，他所承担的责任愈来愈重，他已承担了别人的罪行，也和其他人一样有罪。他的罪比其他人更重，因为他有权纠正司法的不公，却没有采取行动。如果可以，请您明白这一点!一年来，比约将军、布瓦代弗尔将军及贡斯将军都知道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但他们不吭一声!这样的人夜里竟然还能安然入睡!他们有妻子、儿女，而且爱自己的妻儿。

皮卡尔上校以正直人士的身份尽其本分，以正义的名义对上司表明坚决的态度。他甚至乞求他们，告诉他们，他们的踌躇不定是如何不明智，一个多么恐怖的风暴正在成形，而真相一旦大白，风暴会如何爆发。后来，舍雷尔克斯特纳先生向比约将军重复了这一席话；出自爱国热忱，他恳请比约认真处理这起事件，切勿让它愈演愈烈，最终演变成公共灾难。可是，罪过已经造成了，参谋部已无法坦白招供了；而皮卡尔上校被调职，他们将他愈调愈远，甚至调到了突尼西亚。他们甚至想要指派他从事一项必然会招来杀身之祸的任务，莫赫斯侯爵就是在同一地区被杀的。尽管如此，皮卡尔并未失宠，贡斯将军和他保持友好的书信往来，只是揭发某些秘密并非明智之举。

在巴黎，征服人心的真理正在向前迈进，而我们知道这场预料中的风暴将如何爆发。当舍雷尔克斯特纳先生正要向司法部长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时，马蒂厄·德雷福斯公开抨击埃斯特哈齐是备忘录的真正作者，埃斯特哈齐就在此时浮出水面。证人说，他起初惊惶失措，正处于自杀边缘或准备逃走；然后，突然间他变得非常大胆、非常激烈，巴黎为之愕然。因为具体的支持以匿名信的方式出现，警告他敌人正在采取的行动，某夜甚至有个神秘女人交给他一份由参谋部偷来的、能救他一命的文件。我不禁怀疑帕蒂上校是幕后主使人，因为我认得出这种策划很符合他那充满想象力的作风。他的成就——决定德雷福斯有罪——已遭遇险境，无疑地，他要保护他的成就。修订判决?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会枉费他为那虚构的低级故事所做的牵强、悲哀的努力——这个故事可恶的最后一章是在魔鬼岛上，帕蒂不容许这样的事发生。因此，他与皮卡尔之间的决斗终将举行；在决斗中，其中一人将光明正大地让人看到他的脸，另一人则戴上面具，不久我们会在民事法庭上见到他们。这一切的后盾便是参谋部，它仍然为自己辩护，拒绝承认所犯的罪行，这些罪状愈来愈令人憎恶。

在迷茫中，人们亟欲了解谁可能是埃斯特哈齐的保护者。幕后主首是帕蒂上校，他安排一切，主导了整个局势；他所用的方法是如此荒谬，以致马脚四露。

其次是布瓦代弗尔将军、贡斯将军和比约将军，他们觉得有责任使得埃斯特哈齐无罪开释，因为若承认德雷福斯无罪，陆军部便会受到公众的嘲笑而威信扫地。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而其结果也令人印象深刻，因为事件中唯一的正直人士皮卡尔上校成了受害者，饱受粗暴的待遇与惩罚。啊!正义!恐怖的失望充满了我的内心!他们甚至说皮卡尔就是那名伪造者，伪造了那封意欲打垮埃斯特哈齐的电报。但天啊，为了什么?有什么目的?请说出一个动机来。他是否也被犹太人收买了?整件事最滑稽的一点是皮卡尔根本是名反犹太主义者。对，我们正目睹一幕丑陋的场景：负债累累、为非做歹的人被判无罪，而一个充满荣誉感、毫无不良记录的人却声名狼藉!当社会堕落到这种地步，便开始腐化。

总统阁下，这就是埃斯特哈齐事件：一个有罪的人却被证明无辜。两个月来，我们注视着这起悲惨事件的每一段情节，我只能简述，这只是整件事的摘要，但有一天，这起动荡事件的每一部分都会被详尽地写出来。我们目睹佩利厄将军与哈法义少校指挥了一项恶劣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坏蛋变好人，正直人士名誉扫 地。然后，当局便召开军事法庭。

有没有人真的希望一个军事法庭会推翻另一个军事法庭所做的判决?

我所说的甚至不涉及军事法庭的法官，选择他们的方式可以有所不同。由于这些军人的血液中含有纪律的因子，难道这不足以取消他们担任公平审判的资格吗？纪律意味着服从，陆军部长是陆军的最高司令，一旦他宣布原判的威信，您怎能期待另一个军事法庭会推翻原判?以阶级关系来看，这是不可能的。比约将军在他的声明中已为法官铺了路，他们在审理案件时服从他的意见，有如在战场上服从司令的指挥，不假思索地服从。影响他们判决的意见是：“德雷福斯已被军事法庭裁定叛国，所以他是有罪的，我们这个军事法庭不能宣布他是无辜的。现在，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承认埃斯特哈齐有罪，就等于说德雷福斯无罪。”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们脱离这条思路。

他们的判决如此不公平，以至于严重影响了未来的军事法庭，并且使他们所做的决定永远被人怀疑。我们也许可以怀疑第一次军事法庭的判决是否明智，但毋庸置疑的是，第二次军事法庭有罪。他们的借口——我一再重复——是最高首长已宣布第一个判决是不容改变的，是神圣与超越一切的，他的属下怎么敢反对?他们向我们宣扬陆军的声誉，要我们爱戴陆军、尊重陆军。哦，是的，的确，如果你是指国家一旦遇到危险，陆军便立即响应，保卫法国领土，这样的陆军就是法国人民，而我们能为它做的，除了爱戴和敬重别无其他。可是，介入这起事件的陆军并无尊严可言，它不会为我们所需的公义而战。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持着刀剑、明天可能逼迫我们屈服的军人，我们应该诚恳地亲吻他们那把有如神助的刀柄吗?不，当然不应该!

如同我刚刚向您陈述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陆军事件：参谋部的一名军官被同僚告发，在主管的压力下被判刑。我一再地说，他若沉冤得雪，参谋部全体官员便必须认罪。因此，陆军运用了任何想象得到的方法 ——在新闻上运作、声明与暗示及各种有用的方法——袒护埃斯特哈齐，以便再判德雷福斯有罪。共和政府应当带把扫帚到耶稣会的巢穴(比约将军自己这样称呼他们)扫个干净!什么地方可找到刚强、明智又爱国且具有足够胆量彻底改革整个制度、从头再开始的内阁?我知道不少人只要想到战争便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知道国防是由怎样的一批人操纵的!一座神圣的教堂现在已变成了卑鄙阴险、散布谣言、背后中伤者的狡窟，而这就是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地方!人们从德雷福斯事件中那个人的牺牲看到了那恐怖的情景。对，一个不幸、“卑鄙的犹太人”牺牲了。对，几名军官运用了一连串疯狂、愚蠢、放纵的想象力、鄙劣的警察手段、审判官式与暴君式的手腕，却没有受到处分!他们用靴子践踏国家，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将国家要求真理及正义的呼声塞入它的喉咙。

他们也犯了其他罪行。他们的行动是以下流报章为根据，并且让巴黎的流氓为他们辩护——这班流氓现在耀武扬威、目中无人，同时，法律与诚实则因战败而受挫。**当多数人要求的是一个作为自由、正义国家之首的慷慨祖国时，却指责某些使法国陷于混乱中的人，这根本就是一起罪行——尽管真正犯了这起罪行的人正策划误导全世界相信他们虚构的事件是真的。误导、操弄公众意见并使之走上狂热，是一项罪行；毒害谦虚、普通平民的心灵，鼓吹反动、褊狭的狂热，自己却躲在反犹太主义那可憎的堡垒背后，也是一项罪行。法国是人权自由的伟大摇篮，若不消除反犹太主义，便会因此而死亡。以爱国为借口增进仇恨，是一项罪行；正当人类的科学为真理及正义而努力时，把刀剑当成现代的神只来崇拜，也是一项罪行。**

真理与正义——我们曾多么热切地为它们奋斗!现在看到它们被人拒绝、忽视、被迫撤退，是多么令人沮丧!我可以轻易地想象舍雷尔克斯特纳的灵魂如何充满沮丧的痛苦，无疑地，将来有一天，他会巴不得当他在议院被质疑时，曾采取革命性的行动，透露他所知道的一切，扯下所有的虚假面具。他是您忠诚的可靠人士，一位能回顾自己诚实一生的君子。他认为真理本身便已足够——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却已足够——对他来说，这是非常清楚的。他自问为何要破坏平静的局面，反正旭日就要上升。他安详、自信，可是现在即将因此受到惩罚，多么残忍呀!皮卡尔上校的情形也是一样：基于高尚的尊严，他没有公开贡斯将军的信。他的顾虑为他带来声誉，然而当他尊重纪律时，他的上司却忙于中伤他；在他的审讯前，他们用蛮横、令人难以置信的方法进行调查。有两名受害人，两名正直、心胸宽阔的人，他们退后一步，让神做它的工作，但同时，魔鬼也在进行它的工作。说到皮卡尔，我们目睹了一种极不名誉的情况：一个法国法庭允许检察官公开指责一名证人，法律上能有的控诉都加在这名证人身上，但是当这名证人被传唤回法庭解释并为自己辩护时，这个法庭便宣布要秘密审讯。我认为这仍是一项罪行，而我估计这种做法将会激起所有人类的良心，我们的军事法庭的确有很古怪的正义观。

总统阁下，这是很明白的真理，它令人震惊，它将在您的总统任期内留下无法清除的污点。啊，我知道您无权过问，您是宪法的囚犯，也是最接近您的人的囚犯。但是，身为一个人，您的责任很清楚，您一定不会忽略它，您一定会担起您的责任。我没有一刻感到绝望，我知道真理会取得胜利。**我深信——我重复——我较以前更深信真理正在向前迈进，没有什么事物能阻挡它。这起事件刚刚开始，因为现在的情况如水晶般澄清：一方面犯罪者不想透露真理，而另一方面捍卫正义者将用他们的生命见证正义。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现在我在此重复：真理若被埋藏在地下，将会发芽生长；一旦有一天爆发，一切都会被炸开。时间会证明一切，而我们便会知道我们究竟有没有为未来的大祸做好准备。**

总统阁下，这封信太长了，我就此做出结语。

我控诉帕蒂上校，因为他是司法误审中的凶暴主角(不知不觉地，我愿意相信)，他更运用极荒谬与应受谴责的诡计，掩盖他过去三年的恶行。

我控诉梅西耶将军，因为他是本世纪最不公平行动之一的同谋，但其所为至少出自其脆弱的心志。

我控诉比约将军，他手上握有表明德雷福斯清白的不可否认的证据，却将它隐藏。为了政治目的，他犯下这起违反公义、违反人道的罪行。他这样做是为了挽回已受连累的参谋部的面子。

我控诉布瓦代弗尔及贡斯将军，他们是同一起罪行的同谋，其中一位无疑是出自强烈的神职信念，另一位可能是出于使陆军部成为不可攻击的至圣之所的团队精神。

我控诉佩利厄将军和哈法义少校，他们指挥了一项低劣的调查。我指的是该项调查是绝对一面倒的，而哈法义所写的报告是天真、无耻的不朽之作。

我控诉三名笔迹专家，即贝洛姆(MessrsBelhomme)、瓦里那(Varinard)与库阿尔(Couard)，他们呈交了虚假的报告——除非医疗报告显示他们的视力和判断力有问题。

我控诉陆军部在新闻界主导了一项可憎的运动(尤其在《闪电报》与《巴黎回响》〔LEchodeParis〕)，以隐瞒自己的错误，误导公众意见。

最后，我控诉第一次军事法庭，它违反法律，只依据一份目前仍为秘密的文件，即宣判被告有罪。我控诉第二次军事法庭，它奉命掩饰第一次军事法庭的不法行为，后来自己却明知故犯，判一个有罪的人无罪。

在提出这些控诉时，我完全明白我的行动必须受1881年7月29日颁布的有关新闻传布条例第三十及三十一条的监督。依据这些条例，诽谤是一项违法行为，我故意使我自己置身在这些法律下。

**至于我控诉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们，我从未见过他们，和他们没有恩怨或仇恨。对我来说，他们只是一种实体，只是社会胡作非为的化身。我在此采取的行动只不过是一种革命性的方法，用以催促真理和正义的显露。**

我只有一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若胆敢传唤我上法庭，让他们这样做吧，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举行!

我在等待。

总统阁下，我谨向您致上最深的敬意。